



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 现代新诗的文体建构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Poetry and the Stylistic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熊辉 著

【作者简介】

熊辉（1976.10—），教授，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诗学研究，兼事诗歌评论。先后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首批重庆市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重庆市委宣传部首批青年文化人才”。已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和文学评论1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3部，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和人事部博士后基金等10多项课题。

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现代 新诗的文体建构

熊 辉 著

 雷鸣九州文化公司
15810992023

书 名 《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体建构》

成 品: 165 × 238mm

排 版: 张燕

总页数: 348 (包含版权、扉页)

电 话: 15810992023 王洪广

责 编: 韩老师

校 次: 二校

校 对: 曲亚蕊

印张数: 21.75

日 期: 2012年1月11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体建构 / 熊辉著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117-1576-0

I . ①外…

II . ①熊…

III . ①诗歌 - 翻译 - 研究 ②新诗 - 诗歌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 ① I106.2 ② 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2629 号

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体建构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谭洁

责任编辑 韩慧强

责任印制 尹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63(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址 www.cctphome.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毫米×960毫米 1/16

字数 370千字

印张 21.5

版次 201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 68.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序 言

张中良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同外国文学具有密切的关联，外国文学的翻译即是其重要的桥梁。近年来，随着比较文学视野的拓展、翻译研究的兴起，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研究取得了一批可观的成果，譬如关于严复、鲁迅、周作人、胡适等翻译家的研究，关于百余年翻译文学历史之整体或断代的梳理，关于俄苏、日本、英国、法国等国别文学翻译状况的概括，关于莎士比亚、普希金、易卜生、泰戈尔、海明威等作家译介的典型剖析，等等。但是，涉及小说、散文、话剧、诗歌等文体的翻译研究则相对薄弱一些，这或许是因为越是深入到文体机理的研究，难度就越大的缘故。

做翻译研究至少应精通一门外语才好，有比较文学的学术背景则更为理想。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熊辉教授本科为英语专业，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硕士阶段转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博士论文为《五四译诗与早期中国新诗》，而后又承担了“中国现代诗人与翻译”的研究课题，这两项研究的成果均已出版。正因为熊辉具有这样的学术背景，所以，当他2009年来到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时，我作为合作者，自然支持他发挥自己之所长，继续拓展诗歌翻译与中国新诗的研究领域。经过交流，确定以“现代译诗与中国新诗文体”为博士后研究选题，后来，这一选题获得了人事部第46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做学问，有凭聪慧者，也有靠下苦功者，二者均能做出成绩。熊辉感觉敏锐，思维活跃，诗的灵性与思辨能力兼备，当属聪慧型，同时又肯下苦功，做出成绩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博士后研究报告《现代译诗与中国新诗文体》提交后，得到考核小组的一致好评，认为在翻译诗歌与

中国新诗文体建构方面具有开拓性与系统性。经过修订，这份博士后研究报告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成果《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体建构》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我自然十分高兴！

《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体建构》，从现代诗人的译论、诗论、翻译与创作中寻绎出大量相关的资料，其中不少是著者第一次辑录与阐释；在丰厚的材料基础之上，视野开阔，思辨绵密，把翻译理论、翻译实践与新诗创作联系起来思考，在历史的梳理中对典型现象予以深入剖析，对现代诗歌的文体观念、语言建构与自由诗、现代格律诗、散文诗、小诗、现代叙事诗等形式建构同诗歌翻译的关系详加梳理与分析，其中的自觉选择与不自觉的误译，可喜的成功与生涩的尝试，均得以深入细致的阐释，全面、系统地呈现出外国诗歌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新诗文体建构的重要意义；作为附录的“现代译诗研究成果目录”也颇具文献学价值，既为课题本身列出了学术背景材料，也给学术界提供了查阅文献的导向图。这部著作还告诉我们，文体内部的翻译研究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熊辉学术自觉较早，这样年轻就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绩，可以预期，他在孜孜矻矻的探索中，一定会不断拓展学术视野，推出新的成果。

2012年10月4日于北京远郊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外国诗歌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新诗文体建构的重要意义	1
第二节 中国现代译诗的研究现状	5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18
第四节 选题原因及主要研究内容	23
第一章 现代译诗批评场域中的诗歌文体观念	30
第一节 西方文化过滤下的译诗文体选择	30
第二节 翻译伦理批评与译诗语言意义的准确性	45
第三节 翻译论争中的译诗形式批评	56
第二章 译诗语言与中国现代新诗的语言建构	63
第一节 中国现代译诗的语体特征	64
第二节 译诗语言的流变与中国现代新诗的语言诉求	92
第三节 译诗语言与中国现代新诗的语言建构	103
第三章 译诗形式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形式建构	113
第一节 中国现代译诗的形式追求	113
第二节 中国现代译诗形式的多元化	126
第三节 译诗形式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形式建构	161
第四章 外国诗歌形式的误译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体建构	169
第一节 外国诗歌形式误译的普遍性	169
第二节 民族文化审美与外国诗歌形式的误译	176

2 ①…… 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体建构

第三节	外国诗歌形式误译的几种类型	185
第四节	外国诗歌形式的误译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形式建构	193
第五章	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现代新诗各体形式的建构	204
第一节	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现代自由诗体的建构	204
第二节	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现代格律诗体的建构	212
第三节	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现代散文诗体的建构	222
第四节	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现代小诗体的建构	225
第五节	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现代叙事诗体的建构	234
第六章	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现代新诗文体的关系	241
第一节	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文体创新	241
第二节	外国诗歌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新诗文体观念的践行	257
第三节	外国诗歌的翻译与中国现代新诗创作的文体选择	267
第四节	外国诗歌的“翻译体”与中国现代新诗的 文体建设	283
结 语	292
参考文献	295
附 录	现代译诗研究成果目录	308
后 记	339

绪 论

第一节 外国诗歌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新诗文体建构的重要意义

中外诗歌发展的历史证明，要使民族诗歌朝着符合时代要求和民族审美的方向继续前行且“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①。奥克泰维欧·派茨（Octavio Paz）曾这样论述了翻译诗歌对译语诗歌的促进作用“西方诗歌最伟大的创作时期总是先有或伴有各个诗歌传统之间的交织。有时，这种交织采取仿效的形式，有时又采取翻译的形式。”^②我国现代著名翻译家郑振铎先生把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和创作看成是文学家“两重的重大责任”，认为翻译文学是民族新文学和新文体建立的基础“无论在哪一国的文学史上，没有不显示出受别国文学的影响的痕迹的。……威克利夫（Wyclif）的《圣经》译本，是‘英国散文之父’（Father of English Prose）；路德（Luther）的《圣经》译本也是德国的一切文学的基础。”^③中国现代新诗的文体建构历程同样诠释了翻译的重要作用。

译诗文体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后秦僧人鸠摩罗什在翻译佛经时就体认到了文体是译作成败的试金石，他指出：“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人

① 季羨林《我看翻译》，《翻译思考录》，许钧主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页。

② Octavio Paz, *Translation: Literature and Letter*. 参见《翻译文化史论》，王克非编，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54页。

③ 郑振铎《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改造》杂志（3卷11期），1921年7月15日。

呕啻也。”^① 在鸠摩罗什看来，古印度在创作习俗上注重文章语言词句的华丽，但梵文翻译成汉语后其文体色彩便消失殆尽，中国读者只能领会原文大意而不能见识原文风格。没有再现（或本就不可能翻译出）原文文体的译文如同嚼碎了的饭，徒留饭沫碎粒而饭的形状和香味不复存在，读者读之，非但没有审美快感反而会觉得恶心。鸠摩罗什希望译者翻译的时候不要只是为了传达意义，还要使译文文体与原文文体不要存有太大差异，否则译文的可读性就会丧失。台湾学者李奭学在《得意忘言：翻译、文学与文化评论》一书中把翻译文体的重要性强调到了极致，他认为清末人士如梁启超和马君武等翻译拜伦的诗歌时，除了时代的限制而不得不使用文言之外，最让他们感到苦恼的“却常属译体”，相对而言，语言意义的对错是次要的。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歌赋等文类，最常见的情形则是原文模棱，译家的理解两可，而率尔臧否，就变成甲是而乙非或乙是而甲非。……讹误既不可免，那么只要不违常理，对错就不该是判断译家高下的唯一准绳。……因此包括诗歌等文类的文学作品的中译，在基本对错的考虑之外，我们实在不宜再马虎看待译体是否铢两悉称。”^② 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论者的基本观点：一直以来人们在翻译的时候强调得最多的是诗歌的文体而不是语言意义的正误和准确与否，因为翻译的时候语义转换的错误或词不达意在所难免，“文体才是翻译成败的关键”，^③进一步表明文体之于诗歌翻译的决定性意义，话说得虽然有些偏激，但对译诗文体的“良苦用心”却跃然纸上。对译诗文体的重视不仅是基于审美立场，也是因为译诗文体在民族诗歌文体的建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外国诗歌的翻译改变了中国现代新诗的语言表达。任何民族的语言在同其他民族语言的交流过程中都会受到影响，而翻译在引入外国诗歌时也自然会丰富我国新诗语言的词汇，这些词汇不完全是音译外来语，其中也有根据本国语言意译外国新思想新观念而产生的新词汇。20世纪初在翻译诗歌中引入或产生的词汇几乎是伴着中国现代汉语的产生而同时出现在

① 引自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7—18页。

② 李奭学《得意忘言：翻译、文学与文化评论》，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39—40页。

③ 李奭学《得意忘言：翻译、文学与文化评论》，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40页。

中国新诗中，它已经成了中国新诗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的诗歌创作离开了这些词汇就难以为继。翻译外国诗歌不仅为中国新诗带来了大量的新词汇，而且由于翻译表达的需要和原语构词的特点，中国新诗语言的构词方法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也是中国新诗语言欧化的表现。中国新诗诗行的变化一方面是由诗歌节奏和诗歌情感的变化引起的，另一方面也与句子表达方式的变化有关。欧化在中国新诗语言上的体现除了词汇、词法之外，句法可以说又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表征，很多诗人“宁可学那不容易读又不容易懂的生硬文句，却不屑研究那自然流利的民歌风格”^①。可以确定的是，译诗语言使中国新诗的语言染上了浓厚的欧化（准确地讲是外化）色彩，从积极的方面讲，朱自清认为译诗“可以给我们新的语感，新的诗体，新的句式，新的隐喻”^②。但无论如何，我们在接受外来影响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中国新诗语言不可更改的民族特性，才能够使中国新诗在借鉴译诗的基础上焕发诗性光彩。

外国诗歌的翻译促进了中国新诗形式的发展演变。1898年是中国翻译史上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的翻译成就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模式：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了《译印政治小说序》，不仅为政治小说的翻译作了学理上的倡导，而且开启了中国翻译文学的功用性目的；严复《天演论》的出版宣告了“信”、“达”、“雅”必将成为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的理论圭臬；林纾翻译的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次年出版时改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改变了人们对外国文学的偏见，提高了翻译文学在中国的地位。自此以后，外国文学的大量翻译和广泛传播逐渐改变了中国固有的文学格局，促进了中国现代新文学多种文体的发展。首先就戏剧而言，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戏剧新品种话剧是在“建设西洋式新剧”^③的号召下发展起来的“一种西方戏剧形式”，^④翻译戏剧对它的影响程度可想而知。就小说而言，清末兴起的小说翻译热潮对原本遭受歧

① 胡适《北京的平民文学》，参见《新诗杂话》，朱自清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78页。

② 朱自清《译诗》，《新诗杂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72页。

③ 鲁迅《〈奔流〉编校后记（三）》，《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63页。

④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3页。

视的叙事文体来说，其地位经历了由侍从到显贵的戏剧化转变，陈平原先生在论述20世纪初小说盛行原因时认为“域外小说的输入是第一推动力”，^①“不得不把域外小说输入造成的刺激和启迪作为中国小说嬗变的主要原因。”^②新诗发展所获得的刺激、启示与戏剧、小说一样，其原动力来自中国诗歌内部的裂变和外国诗歌的翻译。中国新诗文体发展演变的轨迹其实就是外来诗歌影响的轨迹“五四运动产生了许多诗歌流派，比如浪漫主义诗派（郭沫若），大众化诗派（刘半农），小诗派（谢冰心），湖畔诗派（冯雪峰），新古典主义诗派（冯至），新格律诗派（闻一多），革命诗派（蒋光慈），象征主义诗派（戴望舒）。总之，这些诗派和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外国诗歌（包括东方和西方的诗歌）的启示和影响。”^③据此，有学者认为应该从接受西方诗歌影响的角度来撰写新诗发展史“如果编这样一部文学新诗史也是很好的，即从新诗接受西方诗歌影响的角度来编写，考察新诗在发展过程中到底接受了多少西方的影响，影响的程度有多大，哪些影响的接受较为成功，哪些则只起迷惑的作用。”^④总之，“新文学的小说、诗歌、戏剧形式上较多舶来品，借鉴外国从头做起”，^⑤没有外国诗歌的翻译，现代新诗至少不会与传统诗歌拉开如此大的审美距离，并迅速地确立起文坛的正宗地位。

中国现代新诗文体的资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古代诗歌、外国诗歌以及新诗自身的文体积淀，而新诗文体又是在外国诗歌尤其是外国诗歌翻译体的启示下得以发生和发展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外国诗歌的翻译体是中国现代新诗文体的主要资源。卞之琳承认自己的诗歌形式技巧受到了三个方面的影响“平心而论，只就我而说，我在写诗‘技巧’上，除了从古、外直接学来的一部分，从我国新诗人学来的一部分……我在自己诗创作里常常倾向于写戏剧性处境、作戏剧性独白或对话、甚

①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1897—1916）（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页。

②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1897—1916）（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0页。

③ 刘重德《文学翻译十讲》（*The Lecture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by Liu Chongde*），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第164页。

④ 林庚《新诗断想：移植和土壤》，《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第1页。

⑤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7页。

至进行小说化，从西方诗里当然找得到较直接的启迪，从我国旧诗的‘意境’说里也多少可以找得到较间接的领会，从我的上一辈的新诗作者当中”^① 自然也能找到直接的联系，充分说明了外国诗歌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新诗的文体建构具有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

第二节 中国现代译诗的研究现状

诗歌翻译包括外国诗歌的中译和中国诗歌的外译两个部分，本书所研究的课题在此主要整理外国诗歌中译的研究现状。^② 目的是厘清已有的译诗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并根据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确定译诗研究需要强化或拓展的领域。

一

学术界对外国诗歌翻译的研究主要集中体现在语言形式上。翻译语言学派将翻译看作是两种语言的等值替换或等信息转换，从而将注意力集中到语言和技巧层面上。比如最先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翻译研究的英国翻译语言学派代表约翰·卡特福德（J. C. Catford）认为，翻译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原语）的文本材料”。^③ 美国翻译的语言学派代表尤金·A. 奈达（Eugene A. Nida）说“所谓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④ 不管是强调“等值”替换还是信息“对等”，这些理论都会将译诗研究引向语言层面，从而将诗歌的可译性

① 卞之琳《完成与开端：纪念诗人闻一多八十生辰》，《卞之琳文集》（中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5页。

② 本书在梳理中国现代译诗的研究现状时，主要参考的是20世纪20—40年代主要的谈论译诗的文章、新时期以来主要谈论中国现代译诗的文章和学术专著。对于很多谈论当代诗歌翻译的文章，比如关于飞白、杨德豫、裘小龙、许渊冲、江枫、方平、文楚安、汪榕培等译诗的文章，还有一些涉及现代译诗史上没有被译介过的外国诗人的文章，比如意大利的蒙塔莱（Eugenio Montale），美国的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等，尽管涉及了很多有价值的话题，但由于讨论对象仅仅局限于当代的译诗译事而不在于本书的考察之列。

③ J. C. Catford,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20. 参见《当代英国翻译理论》，廖七一编著，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28页。

④ 参见郭建中编著《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5页。

问题、诗歌翻译的形式问题、译诗能否传达原诗情感等问题作为研究的中心话题。中国现代译诗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股国际翻译研究风尚的影响，很多成果均与译诗的语言、音韵节奏、形式和风格神韵等内容有关。接下来，本书将从语言、音韵节奏、形式、意象和意境的翻译、译诗的审美观照、理想译诗的标准以及译诗的技法等方面来考察译诗的研究现状。

首先，译诗语言的研究。对译诗语言最基础的研究是语言意义传达的正误，这类研究主要发生在新文学早期，尤以创造社的译诗批评为典型，他们在和胡适、文学研究会诸君进行翻译论争时常常采用原文和译文对照阅读的方式去发现翻译语言意义的错误。由于译诗具有很强的创造性和“叛逆性”，对其语义正确与否的分析并不能完全反映出译者能力的高低，因此在当代译诗语言研究范畴中，“纠错型”的译诗语言研究不再引起轰动效应，仅1990年有两篇文章讨论了《行路人》和《六百男儿行》翻译中的语言错误。当代译诗语言学研究比较重视译诗语言的语体色彩、诗性色彩、源语与目标语意义的对等以及译诗语言对原诗情感的传达和再创造等问题。此外，也有借鉴国外翻译理论来从事译诗语言研究的例子，值得一提的是吴南松先生的《“第三类语言”面面观》^①一书的出版，从文学翻译中“第三类语言”存在的必要性、普遍性、主要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研究了译作的语体特色，是目前国内第一部专门探讨翻译文学文体的著作。该书把译诗这种特殊体的语言与其他叙事文学译本的语言毫无分别地加以混合研究，不能凸显出译诗语言的文体特征，而且对译作语言的观照虽然采用了文化批评的视角，但还没能充分挖掘出译作语言的文化特征和文体特征。况且在文化翻译学派看来，尽管从译诗本体出发对译诗语言的研究无足轻重，但译诗语言作为特殊的“第三种语言”还有待从文化诗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去深入研究，这也是当前从语言学的角度去研究译诗存在的最大不足。（关于译诗语言研究的主要成果详见本书附录）

其次，译诗音韵节奏的研究。诗歌文体的特殊性之一在于它能给读者音乐性审美感受，诗歌的音乐性效果是通过音韵和节奏体现出来的，译诗作为原诗在目标语环境中的存在样态必须具备音乐美。目前学术界

^① 吴南松 《“第三类语言”面面观》，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对译诗音韵节奏的研究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某首诗歌的翻译来谈译诗的用韵，比如从冯至翻译里尔克的《沉重的时刻》、查良铮（穆旦）翻译雪莱的《西风颂》、卞之琳翻译华兹华斯的《孤独的割麦女》和胡适翻译蒂斯黛尔的《关不住了》等诗歌作品来分析译诗该如何用韵；二是单纯讨论译诗的用韵技巧以及音韵对译诗审美效果的影响等。译诗的语言由于采用了不同于源语的目标语，因而在音韵节奏的表现方式上与原诗相比有很大的差异，如何在译诗中弥补原诗音乐性的削减以及如何在译诗中再造新的音韵节奏，都是译诗音韵研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但是目前学术界却没有很好地探讨这些问题。同时，中国新诗在音乐性上与古代诗歌的差异还体现在诗歌内在韵律的发掘上，中国古诗主要依靠外在的平仄和押韵来突出音韵美，而中国新诗除此之外还通过情感的跌宕起伏造成强烈的“内在音乐性”效果。既然译诗主要采用的是新诗体，那对其音韵节奏的研究就不可能避开内在节奏，但已有的译诗音韵节奏的研究却没有涉及该话题，这是今后译诗音韵节奏研究的视线需要扫描的地带。（关于译诗音韵节奏研究的主要成果详见本书附录）

第三，译诗形式的研究。诗歌是一种形式艺术，对诗歌的研究离不开形式的探讨。学术界目前对译诗形式的研究主要取得了如下成果：一是对译诗具有的形式特质的论述；二是对译诗形式重要性的强调；三是对译诗形式美的探讨；四是认为形式与内容的和谐统一才能铸就一首好的译诗。黄杲炘先生的学术专著《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英语诗汉译研究》，第二部分“诗，要看怎么译”专门论述了英语格律诗的翻译问题，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怎样转化或再造译诗的格律提供了有益的建议。^①李寄先生的《鲁迅传统汉语翻译问题论》专门论述了鲁迅译文的文体特征，^②遗憾的是由于鲁迅翻译的诗歌作品较少而没有对译诗文体作出探究。这些研究已经涉及了译诗形式的主要方面，但对译诗形式所具有的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特征几乎无人论及，也很少有人注意到译诗形式对中国新诗形式建构的积极作用，这是译诗形式研究的最大缺憾。（关于译诗形式研究的主要成果详见本书附录）

第四，译诗意象/意境的研究。意象和意境是诗歌形象化的标志，不

^① 黄杲炘《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英语诗汉译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参见97—230页。

^② 李寄《鲁迅传统汉语翻译问题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

仅涉及诗歌的语言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源语和译语的文化问题，因此在诗歌翻译的过程中处理好意象和意境就显得举足轻重。目前学术界对诗歌意象的翻译主要进行了如下探讨：首先是如何在新的文化语境中完成原诗意象的转化，比如原意象在译诗中的改变、译诗意象的选择以及隐喻型意象的翻译等；其次是强调意象在译诗中的重要性，比如意象对于原诗情感传达的重要性、意象在译诗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诸多问题。对译诗中意境的研究主要是探讨如何在译诗中再造原诗的意境；译诗中的意境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以及美学特征等。对同种意象或意境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具有的不同含义应该是译诗意境和意象研究的重要内容，如何在翻译中避免意象或意境引起的文化冲突就成了该领域理应解决的问题，今后应该适当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关于译诗意象/意境研究的主要成果详见本书附录）

第五，译诗的审美观照。好的译诗不仅仅只体现在语言、形式或意象意境等方面，它应该是美的集合体。因此译诗研究更多的是从整体上去把握翻译作品的美学特质。学术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研究了译诗的整体美：一是认为译诗最重要的不在译意而在传神，在于神韵的传达；二是探讨译诗的美感和艺术性，以及由此衍生的美学观念；三是认为好的译诗应该是形神兼备，是语言意义和形式艺术的完美结合。第三种研究体现出来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认同，但翻译活动自身的局限以及诗歌的文体特征决定了追求译诗的形神合一只能是翻译的理想境界，不可能真正实现二者的统一。（关于译诗审美观照的主要成果详见本书附录）

第六，译诗标准的研究。长期以来，人们对优秀译诗的认识存在着较大分歧，究竟什么样的译诗才是上等的佳作呢？这涉及诗歌的翻译标准问题，涉及诗歌情感、形式以及风格等诗歌要素孰轻孰重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对诗歌翻译标准问题的论争主要围绕如下几个话题展开：一是认为兼顾了严复所谓的“信”、“达”、“雅”标准的就是好诗；二是认为好诗的标准应该以原诗为参照进行评判；三是认为好的译诗重在达意；四是认为好诗重在艺术美的重现；五是认为好的译诗重在求得意义的“真”和形式的“美”的结合。回顾我国漫漫的翻译历程，各种有关翻译标准的经典命题都不可能是绝对正确或错误的。“它们都会依时间、地点、认识主体之间的不同而不同，亦会依观察者角度、层次、目的不同

而不同。万理万教，虽有理、亦无理，全取决于认识主体在认识坐标系中的位置。”^①但随着译介学的成熟、翻译文学国别归属的划分以及翻译学自身的发展，对翻译标准的认识也会日趋合理。“文”、“质”说，“信”、“达”、“雅”说，直译法，意译法，“风韵译”，“归化说”，“神韵说”以及“化境说”等翻译标准虽然都有不足，但它们各自的合理性却不容忽视，在不同的情况下译者自然会侧重于某一种翻译标准。翻译应该博采众长，使译文无限接近原文。由于文学接受者（含翻译工作者）的文化素养和审美心理有差别，他们对译文价值的认可程度也会出现差异，对此，翻译标准就会因人而异，其结果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翻译的标准应该是多元化的，而且各种标准只有在互相补足的情况下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才能成就“文质彬彬”的译文。（关于译诗标准研究的主要成果详见本书附录）

第七，译诗技法的研究。任何翻译都涉及两种语言的符码转换，如何充分实现两种语言的意义转换和语体色彩的对等，这是对译者翻译能力的基础性考验。译者翻译能力的高低常常与其掌握的翻译技巧和方法有关，因此对译诗技法的研究构成了译诗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学术界对译诗技巧和方法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通过具体的译诗作品或译诗作品的对比来论证译者应该怎样去翻译诗歌；二是描述隐喻、专有名词、长短句、修辞手法、格律诗等具体的译诗语素和形式要素的翻译方法和经验；三是专门探讨译诗的策略和方法。（关于译诗技法研究的主要成果详见本书附录）

二

对译诗的赏析和对比阅读、对译诗和诗人译作的总体评价、各社团流派及刊物译诗的研究、外国诗歌在中国的翻译状况等也应该是中国现代译诗研究的题中之义。除了语言形式研究会专注于译诗本体之外，这些研究从某种程度上延续了翻译语言学派的思路，依旧将注意力集中在译诗的语言和形式特征上。

首先，译诗的鉴赏。译诗一旦进入民族文学的发展序列，就会被视为成熟的文学文本而进入研究视野，因此鉴赏译诗如同鉴赏本国诗

^① 辜正坤 《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81页。